

老莊

张松如

陈鼓应

赵明

张军

论集



老莊

論集

张松如
陈鼓应
赵明
张军





13.133

ZSR

辑：王鲁一

计：王悦玉

张松如 陈松如

赵明 张 军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恒利大厦)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230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精装印数 1—1500 平装印数 1—4600

精装定价 4.05元 平装定价 3.00元

书号 2206·41

前 言

老庄思想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几千年来，它同儒家思想一道，参与了民族文化的构成，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巨大传统力量，在积极与消极的方面，都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部论文集，就是从老庄思想这个侧面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进行的一种尝试性的探讨。

中国哲学思维的产生和自觉文化的开始，不是出现在夏商“奴隶制”时代，甚至也不是出现在领主封建制的西周时代，而是出现在氏族公社基本结构解体的春秋战国这一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在理性觉醒和哲学反思中出现的诸子之学，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化的成熟，在近代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之前，始终为后来的各种理论所宗所本。但在百家之学中，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还是儒、道两家。这是因为：儒道两家在社会与自然、群体与个体的对立中各自把握了一端，从而使它们能够揉合各家，以其对立和补充，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儒家的伦理型哲学代表了宗法思想文化，道家的自然型哲学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宗法思想文化的怀疑、否定和批判。这样又使儒道从正反两个方面实现了相溶与互补，给中国思想文化的开拓演进带来了活力。

要对老庄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出较为

公正的评价，必须把它放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结构关系中来考察。在封建时代形成并发展起来而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学说，是中国封建宗法关系的理论表现，其学说的特点是注重社会人事，突出探讨伦理道德规范，强调求知即在践履道德，从而将一套人伦规范，作为其哲学认识的主要对象。从人类思维系统所包含的认知、评价、审美这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又互有区别的层次来看，儒家哲学强调并突出了人类思维的第二个层次，亦即评价这个层次。我们可将这种形态的哲学，称之为“伦理型哲学”。这种伦理型哲学的长处是致力于人生、道德问题的探讨，留心人际关系；缺陷则是这种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实践理性使认知局限在人伦关系的范围，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而道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便在于它弥补了儒家伦理型哲学的这些严重缺陷：道家哲学的立足点虽也不曾离开“人”，但是它在不满和否定宗法关系时，却把人类的思考范围由人生而扩展到整个宇宙，从而将社会与自然，都置于宇宙和“道”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来加以认识，进而主张人与自然万物，均需以“道”这个宇宙的总规律为理法，并且提出“道”的属性即在“自然”，由此而建立了“自然性的哲学”。可以说，老子之学通过新的方法建构起来的这个思维开阔、范畴众多、具有鲜明的哲学思辨色彩的思想体系，开创了中国哲学的另一传统。同将人伦规范作为哲学认识的主要对象而突出了人类思维第二个层次（评价）的儒家哲学比较起来，老子的探求世界本体及其运动规律的哲学和它那套论理的方法，显然更突出了人类思维的第一个层次（认知）。被某些学人看作是充满了“消极因素”的老子哲学（不是没有道理），居然能够在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的长达数千年的时

空中，始终葆有活力，同儒学相匹相抗，其原因何在？这原因不仅仅在于它的人生哲学和政治思想在那个时代具有其赖以存在和流播的社会土壤；更为主要的是，它的突出了认知的哲学比起儒家和其它学派更能满足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要求。理论思维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精魂，是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从战国时代开始，到近代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前，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举凡这个时期所出现的哲学家和产生的哲学流派，几乎都同老子哲学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老子哲学体现了极高的民族智慧，显示了理论思维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老子哲学对于深化民族理论思维能力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是我们不应该无视和忘记的。

与老子并称的庄子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做出了独特的奉献：一方面，他继承了老子思想，并在许多方面有了重大发展，从而使道家真正成为一个与儒学旗鼓相当的学派，深刻地影响了、极大地丰富了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庄子又以其对人生所抱有的超脱态度、浪漫不羁的想象和形象、淑诡瑰丽的言辞，显示出一种世罕其俦的艺术风采和美学特质。这艺术风采和美学特质，不仅产生了滋养中国文学艺术不竭的美感源泉，而且构成了中国文学肌体上的血肉，并进而升华为中国文学的灵魂，结晶为艺术理想与美学追求。陶渊明、李白、苏轼、马致远、汤显祖……，这些曾使中国文学熠熠生辉的诗人和作家，有哪一个在自铸玮词时不是受到了庄子的滋溉呢？

因此，基本是在封建时代形成的灿烂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虽以属于评价范畴的伦理道德思想为其主要特色，但是也并不缺乏认知与审美的传统。如果在我们的案头同时摊开《论

语》、《孟子》、《老子》、《庄子》这四部书，对比观照，便会有这样一种清晰的感受：前二者具有明显的道德伦理意味，评价既统摄着认知，又支配了审美；而后二者虽然也不乏评价，但却反映了强烈的认知与审美的探索 and 追求。人类的思维所包含着的认知、评价、审美这三个基本层次，它们本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个系统的整体，正因如此，康德才用他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系统考察了人类思维的三个层次，也正因如此，黑格尔才说真、善、美是融为一炉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和学派中，由于主客观各种复杂的原因，哲学家或哲学派别又往往会突出人类思维的不同层次。在中国，如果说儒家哲学的特点即在突出了评价（也含有认知与审美）这个层次的话，那末，相对说来，老庄哲学的特点便在突出了认知和审美（同样含有评价）；如果说长期以来，由于儒家思想居于主流地位，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以伦理意识为中心特征的话，那末，老庄之学所具有的那些特质以及其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岂不也是显而易见而弥足珍贵的吗？

毫无疑问，今日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是在与古代完全不同的基地上产生的。但是，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来说，传统总是一个巨大的力量，经过现实的选择，它的一部分不仅会通向现在，甚至会伸向未来。处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目标是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传统究竟能够给予我们什么呢？这还需要深思，再深思，探索，再探索。

基于如上的认识，我们把近年来所写的有关老庄思想探索和研讨的文章，长长补短共二十篇，汇集起来，合为一编，姑

取名《老庄论集》。

《论集》是由几个人撰写的。非成于一时，非成于一地。除个别情形外，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大家多是个人写个人的，并没有或极少在一起讨论过，更没有拟出一个共同遵循的提纲。虽然如此，《论集》却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表现了作者看法的一致或接近。

首先，对于春秋战国这个被历史学家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看法，作者都不同意它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而认为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春秋战国时代的变革，乃是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变，我们称其为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在此之前的西周封建制，即封建领主制，由于是从家长制家庭奴隶制直接转变而来，因而与封建关系并存，表现为农民一定程度上的奴隶化倾向；在此之后的封建制，即封建地主制，封建关系虽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具备了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基础，但是，作为封建剥削形式之补充的奴隶剥削方式依然不曾断绝，甚至在某种限度内继续有所发展。这是中国乃至东方封建制社会历史的特点之一。我们这样看待历史学家们聚讼未决的古史分期问题，因而便认为活动于春秋末季的老子和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庄子，他们也就不可能是什么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

其次，关于老子庄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我们认为那种颇为流行的“没落贵族”说是缺乏根据，不能使人信服的。老子本属“隐者”阶层的思想代表（《论语》中的长沮、桀溺、荷蓑丈人就属于“隐者”），这些隐者从统治阶级中分离出来，有一小片土地，自己也亲身参加一些劳动，其地位与农业小生产者相近，故他们的思想，不仅表现出对农业小生产者的同情，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阶级要求与愿望。这方面的思想言辞，在《老子》中多有表述，不存成见，自应看得到。至于庄子，他的思想言辞以及在《庄子》书中清晰显示的庄周形象，更带有接近“农与工肆之人”的士阶层的特征：他的自甘贫穷、不求富贵、不愿为统治者服务的不受拘束的人生态度，他的藐视权势、十分看重个人自由的思想，都充分显示了士阶层的思想性格特征。

第三，应该如何评估老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也有一致之处：老子庄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开创了不同于孔孟伦理型哲学的另一传统。老庄哲学无论在哲学概念和范畴的提出上，还是在深化抽象思维能力方面，都对我国文化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对我们民族理论思维能力的发展，起过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没有这种形而上学的、真正思辨的老庄哲学补充儒家伦理型哲学的不足和缺陷，没有道家的这种具有反叛的批判力量和怀疑精神的思想经常给予正统的、僵化的官方哲学以有力的冲击和否定，中国文化系统的建成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在对老庄思想的一些具体看法上，《论集》的作者容或还各自持有可以相互补充的不同意见；但是，于以上几个方面，却是殊途同归。在分别研究中所达到的一致认识，这便是作者们能够以《论集》的形式结合起来的前提。我们愿以此敬献给侪辈同好，就教于宇内方家。

《论集》中收集的探讨老庄哲学的某些文章，曾得到过李锦全先生的批评、教正，并由此而相与讨论；为便利读者，故将李先生的文章也作为附录列入集中。借他山石，取以为

错，以琢以磨，以切以磋，启我良多，实言铭谢。虽曰争鸣，
嚶其友声，不敢掠美，特此声明，竭诚希望得能续闻若此伐木
之丁丁也。

作 者

1986年3月

目 录

前言.....	(1)
论老子.....	张松如 赵 明 (1)
老子哲学系统的形成.....	陈鼓应 (45)
庄子论“道”	
——兼评庄老“道”论之异同.....	陈鼓应 (90)
庄子认识系统的特色	陈鼓应 (118)
关于庄子研究的几个观点	
——序刘笑敢博士《庄子哲学及其演变》.....	陈鼓应 (133)
庄子哲学初探	张松如 赵 明 (139)
光辉的无神论思想	
——论老子之“道”兼答李锦全同	
志	张松如 赵 明 (153)
哲学家的庄子与艺术家的庄周	
——兼与李锦全同志商榷	张松如 赵 明 (176)
【附录】老庄哲学的神学特色	
——与张松如、赵明同志商榷	李锦全 (190)
《齐物论》的理论结构之开展	陈鼓应 (204)

说“蝴蝶梦”	张松如 (223)
蝴蝶梦	陈鼓应 (229)
“逍遥游”义辨	赵 明 (233)
论庄子的“至德之世”	张 军 (246)
屈原、庄周浪漫主义比较论	张 军 (261)
论庄子的浪漫主义理论和艺术实践	张 军 (270)
意出尘外 怪生笔端	
——谈庄子的浪漫主义兼及庄、孟比	
较	赵 明 张 军 (282)
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学	赵 明 (295)
道家思想与两汉文学	赵 明 (311)
道家思想与魏晋文学	赵 明 (327)
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	陈鼓应 (344)

论 老 子

张松如 赵 明

一 其人其书

老子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位古代思想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他与孔丘、墨翟鼎足而立，创立了道、儒、墨三大显学，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老子的事迹、著述，司马迁《史记·老子传》有这样的叙述：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夫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

“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作为道家思想的奉仰者，司马迁在这里可能对老子作了若干夸张；同时，因其所记事迹太简略，也难免会有某些环节上的纰漏与出入。但《老子传》中老子事状，决非司马迁臆任之笔。《老子传》说老子姓李，名聃，为楚人，生于春秋末期，曾任东周王朝掌管图书的官职以及孔丘曾向他问礼，并后来著《道德经》诸事，这与先秦文献中有关老子活动和言论的记载，基本是一致的，大体上是可信的。著名学者高亨先生根据这一基本线索，参对《左传》，发现其中所记东周王朝的老聃即为老聃其人，从而补充了老子生平事迹的某些阙如之处。如果高亨先生这一说法不错的话（我们认为是有道理的），那么，据以推算，老聃当生于公元前571年左右，比孔丘（公元前551年）约大二十岁。老聃早年大概就做上了东周王朝掌管图书的官员。中年时代，曾因受到周王朝权贵们的迫害，一度避难于鲁国。史传孔丘问礼于老聃，看来当在鲁地，而不是在东周王朝。公元前530年，大约在他四十几岁以后，又被召回周王朝，仍任掌管图书官职。公元前516年，周景王死后，王朝掀起内战，景王之子王子朝在与悼王、敬王争夺王位失败后，带着东周王朝的图书逃往楚国，老聃也就因王朝图书南迁而失去了职位，不得不离开周王朝，西出函谷关；后来他流落并客死于秦国。《老子传》说老聃“见周之衰，乃遂去”，盖指此事而言。其时老聃已经五十几岁，他著《道德经》，当在此之后。高亨先生对老子事迹所作的这些细节上的考证，在基本点上，与《老子传》是没有什么矛盾的。^①老聃中年时代曾受过周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迫害，被迫出逃鲁国，晚年又失去了职位，从统治阶级下层人物进而沦为庶众，他一生中那些坎坷艰难的遭际，与贯穿在《老子》全书中那种反剥削、反压迫的思想也是相吻合的。

对于《老子》其书，也应该依《老子传》肯定为老聃所著。它是一部正式的哲学著作，包括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司马迁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老子》书，盖初成于春秋末期，流行于战国时代，先秦诸子，如《庄子》、《荀子》，以及《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多所称引，在《韩非子》中甚至有《解老》、《喻老》两篇。1973年12月从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帛书《老子》的两种写本，现分别称为甲本、乙本。甲本字体介于篆隶之间，不避“邦”字讳，其抄写年代，当早于高帝时期，可能是在秦楚之际；乙本字体是隶书，独避“邦”字讳，而仍用“盈”、“恒”二字，其抄写年代，可能是在高帝时期，当在文、景之前。两者距今都已有两千多年了，是目前所见到的《老子》一书的最古本子。

总之，我们依《史记》肯定老子是春秋末期人，《老子》一书当为老聃所著，虽然还有某些细节需要进一步去探索、考辨，但是，从基本事实方面来看，司马迁《老子传》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记载，无疑还是经受住了历史的各种检验的。鲁迅先生的《出关》，是借古讽今的小说，虽某些细节借鉴于《庄子》，容有荒唐曼衍无端崖之辞，而他依据的史实，则基本上也是取资于《史记》。

二 春秋末年的社会矛盾与 “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

《老子》一书，生动地反映了春秋末年的社会矛盾。

大量文物证明，春秋中叶，我国的冶炼技术已经很发达了。

随着冶炼技术的日渐发展，铁器的使用范围也扩大了，它不仅应用到农业生产上，而且进一步推广到手工业生产领域，提高了生产能力。手工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商业的发展，其影响所及，不仅产生了大批的商人，又促进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加速着领主井田制向地主庄园制的转变。

与此相应，本已衰微的周王室更加贫弱，而楚齐秦晋等大国的争霸却愈演愈烈。各小国对大国，不但担负着献贡纳赋的义务，而且它们居于“诛求无时”的大国中间，随时又都有被侵夺兼并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劳动人民都在承受双重剥削的痛苦。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对土田按亩收税。四年之后（公元前590年）又“作丘甲”，按丘征发军赋；到了公元前483年，更采取“用田赋”，按土地征收军赋，把税收和军赋一致起来。繁杂的税赋制度，固然反映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可是，它却给农民带来了过重的经济负担。春秋末年，象鲁国那样按土地征收军赋，实行双重剥削的办法，已经成为各诸侯国普遍施行的制度。公元前548年，楚国也实行按土田定军赋制。公元前538年，处于晋楚军事大国夹缝间的郑国，继鲁之后，又采用“作丘赋”制。当时国人把这种举措，比作“蜂蚕之尾”，可以想见人们对加赋的态度了。诛求无厌，不仅使鲁、郑这类小国的劳动人民陷入了极大的困苦，就是象齐、晋那样的大国，也由于实行了“民三其力，二入于公”的苛重剥削，造成了“人民病苦”、“庶民罢敝”、“道殣相望”、“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三年）那样一种民不聊生的局面。可是，“征敛无度”的封建统治者，竟连采用这样苛刻的剥削也还感到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求。在鲁国已经实行“初税亩”之后，当有若向鲁国统治者提出“盍彻

乎”的建议时，鲁哀公居然表示“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论语·颜渊》）。这说明，在领主井田制向地主庄园制转变这一时期，统治者并不仅仅满足于向农民征收大量的实物地租，而且还要他们额外承担大田上的剥削。我们从鲁、郑、晋、齐所实行的这些苛重的剥削中，不难想象当时各诸侯国农民在战争和赋税力役上所承受的负担是多么沉重了。

与“人民病苦”、“道殣相望”情景适成对照的，却是各诸侯国封建统治者“宫室日更、淫乐不违”的生活。如：“楚为章台之宫”（《左传》昭七年）；“晋铜鞮之宫数里”（《左传》襄三十一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晋，……造舟于河，十里舍车”（《左传》昭元年）；“郑伯有饔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左传》襄三十年）。在这样一个贫者饥、富者奢的情况下，不甘死于沟壑的人，常常铤而走险，起来为盗：在鲁国，则“鲁多盗”（《左传》襄二十一年）；在郑国，则“郑国多盗”（《左传》昭二十年）；在晋国，则“盗贼公行”（《左传》襄三十一年）。统治者面对着这种情况，自然要使用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种伴随徭役地租向产品地租转变过程中而产生的“法律的规定”，对一切违抗封建剥削的行为实行无情的镇压^②。如果说晋国士文伯对郑国子产所说的“敝邑以政刑不修，寇盗充斥”（《左传》襄三十一年）表明了统治者企图以加强“政刑”来消弭“盗寇”的设想，那末，公元前536年郑国的铸刑书和公元前513年晋国的铸刑鼎，则是适应着徭役地租向产品地租的转变，以法律代替了鞭子。

这些，就是春秋末年的社会情况。在地主庄园制取代领主井田制这个封建经济转型期，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是减弱了，而是大大加强了。这是因为：在领主井田制下，领主